

新作品

杨峰
孙晓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第9期(总第26期)

小时候，每天哈星(傍晚)都提菜篮去种田大舅家的菜地摘菜。我阿乳(阿妈)有三个哥哥，很多堂哥堂弟，所以我就有很多舅舅，为了能让我分清楚各个舅舅，阿乳在称谓之前再加个前缀，比如当老师的那个大舅叫教书大舅，这个在家种田的大舅叫种田大舅或打柴大舅，有一个大舅是眼瞎的，专门放牛，我们就叫他眼蒙(把盲轻读成蒙，避免对亲人的不敬)大舅或撑牛(放牛)大舅。另外还有烧窑大舅和烤烟大舅等等。

种田大舅很勤劳，娶回来的舅妈也很勤劳。这个勤劳的舅妈有个特别的爱好，种菜。她闲不下来，一有空就种菜。种田大舅家的菜太多，用各种青菜喂猪喂牛喂鸡鸭鹅。种田大舅家离我们家不远，每天夕阳刚偏西时，他就经常站在塘水岸边大声朝我家喊：“十七——还不去摘菜？”我在家庭同一辈出生的女丫中排第17个，所以就有了“十七”之称。种田大舅嗓门大，一声悠长的吆喝不止我们全家人听见，甚至整个六一塘村的人、它铺街的人，还有在田里干活、在马路上走的人全都能听见。年纪小的我以为种田大舅的吆喝而扬名全大车村，很多人只要见我就笑着打趣，“今天摘菜了吗？”

种田大舅家的田地都在老城背的东南面和正南面，我住在它铺东头，去摘菜需要从城背后的东面路走。那条路是依着细窄水(小溪流)、顺着老城墙的堤岸而绕弯。路边长满臭草花、三月坡、老鼠屎藤、芒花，还有长刺的荆棘树，细窄水就好像是被深深隐藏在坡下的盛草之中。我虽然从此这河岸边的路来来回回走了近两年，却没有下去过。

我常走的这东面城墙已经不完整，倒塌了好几处，只剩三四块残缺不平的断墙。这些墙虽然已经残缺，但在当时矮得只比菜篮子高不了多少的我看，它已经高得让我仰望。因为城那边有房子，还有城里的成片芭蕉林和龙眼树，西落的月头(阳光)被遮挡，从河岸路边看去，这向东的城墙被夕阳拉出一大片幽明的暗影。虽然有些倔强的夕阳光能透过房屋的空处，穿过重重芭蕉林和龙眼树林，终于照抵城墙残缺的缺口处，再从残口处生长的杂草中钻射出来，但它们也被削弱了亮度和暖度。逆光看去，觉得这些夕阳带有了树叶和塘水般幽蓝的色彩，甚至它们折映出来的光晕也是冷色调的。当晚风吹来时，仿佛觉得老城里面那大塘水(塘水)里的阴森气息，塘水和城墙之间的那片野地的荒凉气息就从这断墙的缺口处流出，汹涌袭来。我会莫名地突然打个冷战，心里揪紧，加快脚步走开。摘了菜后，原路返回，还得踏上那条被阴影迷蒙的河岸路。越是害怕的地方越是管不住眼睛，固执地不听心里的叮嘱偏要朝那面老墙看去。这时候夕阳又沉落了一些，阴影比原来铺得更开，也更加幽凉。我提起了菜快步走。

经常是回到我家屋后院子的门口，我

不敢放慢脚步，把悬紧的心放松下来，大胆地回头看那片已经渐渐变成一大片幽暗的城墙。总是在这个时候，会有成群的鸟朝那里飞去，隐没在幽暗之中。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鸟扑向那里，我们这里多得是山林，它们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栖息处，为什么像是被什么吸引了一样扑向那里呢？我以为那些鸟一定都是傻子，忍不住要同情它们。

我跟沙蛭、风尾、三姐、亚叨、天骨等几个伙伴说，他们一致认为住在那里的是傻子。我表态说，那些鸟如果想住到我家里来，我愿意挖很多墙洞给它们住。我不是说而已，我是真的行动起来。沙蛭和天骨还有亚蛇三个人帮着扛了一把木梯来，我爬上去，在我家楼外面的沙浆墙上挖墙洞，还放好了一些羽毛和杂草。只是当我挖到第三个墙洞时被二哥发现，然后被阿乳逮着。阿乳严厉地骂我一顿，禁止我再这样恶意挖墙。阿乳说再这样挖墙，楼就塌了，到时候鸟不来我们家住，反倒是我们成了没房子住要住鸟窝的难民。这事很快就被传出去，少不了被人笑。人们除了问我“今天去摘菜了吗？”之外还多问一句，“今天又给鸟挖窝了吗？”

早起上学，常常能看到成群的鸟从那片老城墙的树林里飞出来，吵吵闹闹的。哈星去摘菜来回的路上，也常常能看到成群的鸟纷纷停落在老城墙的树林里。可能是没能为这些鸟挖到墙洞做窝的原因，每当看到它们，我都有点儿愧疚。也可能因为对住在这里的鸟儿有愧疚，渐渐地也对这老城墙起了同情心。

我们这里以前村村都高筑厚墙，可以说一个村庄就是一座城堡，防敌在外，保护村民安全在内。后来解放了，土改了，没有烧杀抢掠的土匪了，高墙就成了人们嫌弃的障碍物。无数面坚固墙被上百号人昼夜轮流敲打，在人们眼前一点点变成残块或化为尘埃，只偶尔有那么几段幸存。

但同情和怜惜并不等同于喜欢和不害怕。那里一直是我不敢轻易走近的禁地，它以幽灵的身份潜存在我的心里某个角落。在乡村，大人喜欢讲鬼故事吓顽劣的小孩。大胆的小孩子又喜欢讲鬼故事吓胆小的孩子。我被大人吓过，也吓过比我胆小的孩子。我有编故事和讲故事的天赋，把所有做过的噩梦重新整理一遍，挑出最可怕的情节加以发挥想象，编得更奇巧些。不少胆小的孩子被我吓着，大白天也不敢走近那里。噩梦多说几遍以后，连我自己都相信是真的了。我百分百地肯定，

关公蟹

□黎化

自幼生长在黄海海岸边，见惯了大海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出产，然而，头一次将一只蹬踏着鳌足的关公蟹捉在手里，依然感到了身心的震撼。

蟹壳约有银元大小，泛出血红，上面竟然精雕细刻出一张人脸，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颤骨部位也高高凸起；细细地看，“眼睛”上方甚至还有两道茸茸的眉。大海的鬼斧神工让人难以解释也难以理喻。谁能告诉我：这蟹壳为什么没长出牛头马面狗模狐样而偏偏长成了一张人脸呢？

本以为“关公蟹”只是海边渔民的随意叫法，曾为此查阅《辞海》，居然辟有专门条目：关公蟹。“甲壳纲，关公蟹科，头胸甲赤褐色，背面有大疣状突和许多沟纹，形似旧时戏剧中的关羽脸谱，故名……”

关羽的脸，《三国志》并未着墨，而据《三国演义》描述，该是“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戏剧中的关羽脸谱基本也按此述勾勒；而这张蟹壳上的脸，却睚眦张裂、狰狞可怖，颇似寺院看守山门的怒目金刚，与人们印象中的关老爷形象相去甚远。

于是，请教一位长居海边的老先生。老先生跟我同姓，虽只念过几年小学，却装了一肚子的掌故风情。他给我讲了一个黄海边的传说——

关公蟹其实并非关羽所化，而是为关羽所戕害的冤灵。那回，关羽兵出荆襄，攻占樊城。曹操手下大将于禁、庞德率军来援。关羽出马大战庞德，久久相持难以取胜，于是改用水攻，掘开襄江水淹七军。庞德帐下数万大军差不多尽被淹死。将士们输得不服，冤魂不散，全都变成了这种举螯横行的螃蟹，成群结队出没于湖泊沼泽之中。一年之后，关公败走麦城，正要策马逃脱，成千上万只螃蟹一拥而上，绊倒了日行千里的赤兔马，导致关羽遭擒遇害。复仇之后，螃蟹们再也无法在荆襄一带待下去，只得顺着长江漂游而下，流落到了南黄海岸滩。

老先生讲述时语气平静、徐缓，阅读广泛的我却听得心惊肉跳，感觉这个民间传说很有些深刻的意味。被世人捧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的关老爷，在这个传说里恢复了他身为军阀将领的本来面目，英勇、多谋且残忍。而那些一向被历史视作草芥蝼蚁的普通士兵，传说却赋予了他们头可断、血可流、不报大仇不甘休的豪迈烈气。更值得激赏的是，这一民间故事摒弃了简单的道德是非评价，客观地反映了战争的血腥、残忍和悲壮……值得咀嚼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默默沉思之中，我对关公蟹油然浮生一股敬意。不管这一海洋生物是否真的与亡命沙场的将士有关，凭老先生讲述的这一民间传说，也凭老先生那久历沧桑的深沉语调，都不容我轻视这小小的生命！

想把它放回大海，然而，它却死了，死在我们好奇的拨弄之中，死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之下。我忽然觉得，本来它就应该属于历史，只是穿越了时光隧道才来到今天……

老城墙

□王勇英

那片荒凉的城背后处一定住着各种鬼怪，它们一到哈星就用妖气把鸟吸到树林里去，常常被自己吓出一身冷汗。

有一年，我阿乳为一个表姐说媒，嫁给城背村当兽医的后生阿朱大，在我家见过面后就一起去阿朱家。阿朱大的阿妈带路，我们抄近道走，要路过我经常去摘菜的那面老城墙。下到河岸底，惊讶地发现，这下面并不像我从上面看下来时所感觉的那么荒凉。这里有清清的溪流、绿绿的青草，水中还放有两块石头当桥，岸边铺有大小两块石头用来洗衣洗菜。河岸的对面，有一条窄小的石头阶梯，小得只能容一个大人过，小得几乎淹没在榕树叶底下，以前我以为那城墙单开了一个小门洞而已。从这条阶梯走上去，进了那个小门，到了一个干净而幽静的小院。院周围种了芭蕉树、李树和桃树，还有一小片菜地。院子里架了四根竹竿，晾晒有衣物和被单。一排六间过的新砖瓦房借着后面的城墙建起。新屋和老墙的色彩对此强烈，但有了一股鲜活的气息。这个院子也养有三条狗、几群鸡鸭，它们为这个小院增添了暖暖的生活气息。这家人是惟一还住在老城背后的人家，他们在旧址上建了新屋。原先住老城的人家已经搬到城外起新房了，只留下一片倒塌的旧屋地让杂草疯生。

阿乳有时候会丢三落四，在最不能出错的时候她发现，把这对年轻人的八字单落在家里了。小孩子理所当然被支使跑腿，我推脱不掉这个任务。

当我走到院子，为难了，不知选择哪条路走。从原路出去要从细窄水过，要经过我编讲鬼故事的老城墙边。从城内穿过，要从三条看家狗的面前走过。它们趴在脚下，张大嘴巴看着我。我觉得它们很想咬我，一直在等机会。想来想去，最后我还是从后门出去。我走下石头阶梯，到细窄水下时，不经意转头看去那面高无比的墙，正好一阵风吹过，树木摇晃起来，树叶的响声听起来像雨声。我突然害怕了，感觉被我编出来的那些妖怪全都站在墙上对我扮鬼脸。惟一能做的就是放声大哭，直到院子里的人听来解救。阿乳笑骂我，平时就会装凶，大白天走这里也哭。

“莫叫(哭)，我让你朱三带你去摘龙眼。”那家的女主人说着朝龙眼树那边喊了一声，“朱三——”

“噢——”从树林里传来一声回答。

我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龙眼树那边的一处断墙上。朱三这家女主人的第三个儿子。

“去吧。他摘龙眼给你吃。”这家女主人说。

阿乳笑着在旁边说，“按辈分，你喊他小叔。他比你大一个半月。”

我阿乳就有这等本事，只要她用心去理顺一下，就能把一个可能几代没往来过的人给牵出亲戚关系来。

他手中已经递下来一束龙眼，我忍不住走过去，接住。阿嬷(奶奶)曾说会哭的

孩子有好东西吃，我现在又再一次验证这话没错。

“上来。你能摘到更多大龙眼。”阿朱三拍拍墙头说。

我不敢，我觉得我能走到这里来拿龙眼就已经很大胆了，怎么可能再爬上这面城墙去呢？

“你想看鸟窝吗？有一百多个呢。”阿朱三说。

一百多个鸟窝？那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伸手把我拉上墙去。我跟着他像猫一样慢慢爬往更高处的墙头。这墙头在外面看很可怕，可是爬上来以后就不那么害怕，因为墙面很宽，在平整的地方能容得下我整个人躺下来，在断残处也像台阶一样可以行走，只是要小心那些长在表面上的青苔和藤条。

我跟着他爬到其中一面城墙顶上，坐下来。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在树杈间看到很多鸟窝。有一些鸟窝还挂在常青藤上，就像草袋子。

阿朱三说他天天都在这里坐很久。他在清晨来这里看鸟飞出窝，傍晚看鸟飞回巢。他说那些鸟不怕他，有时候他在这里坐着的时候，鸟也会停在他身边，甚至还吃他放在旁边的果子。我们在说着话的时候，有鸟停落在不远处的墙面上或草上。它们蹦蹦跳跳着朝他靠近，有一两只还停在他的手掌上、头顶上。我羡慕地看着，也想像他一样，可是那些鸟儿歪头看看我，犹豫着不敢靠近，当我伸手出去时，它们就全都飞走了。他说鸟很小心的，也懂得观察人，它们观察过他很久，知道他对它们好所以才敢靠近，生人它们是不靠近的。我也想像他那样成为鸟儿的熟人。

阿朱三说有些鸟窝是他搭的，可是鸟不住，它们只住自己搭的窝。阿朱三还说，这墙上长满的那些藤结出来的果子能做透明的凉草，就像东平街上人家卖的那种凉草。我低头看看牢牢地爬在墙上生长的那些藤，也觉得新鲜，还是第一次知道吃的凉草是由这些藤结的果做成的。阿朱三说，这墙根下还长有一大片三月坡(野草莓)，三四月的时候结满果子，红红一片。他又说，经常在这里看到我从那边路走过，摘菜，可因墙上的杂草和小榕树生得太浓密，我看不见他。他还听到我和沙蛭他们讲鬼故事。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低头咬手指。阿朱三说，这里没有鬼，不可怕，因为这里有很鸟。有鸟居住的地方都是干净的，有仙气的。

我相信他的话。

当田野间都长满了丰美的禾苗，恰恰又刚下完一场雨之后，站在这河岸路边看这面老城墙上的风景特别美。我不再觉得这残断的城可怜、孤独和寂寞，曾经是威武高墙的它们如今也没有萎靡、颓败。只是城墙那股护城时的霸气不再咄咄逼人，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力量和能量承托那满墙草木，让它们攀附着尽情生长，放释绿色的生命。

父亲在世的时候，闲不住，屋前屋后的边角地带，都被他悉数种上了瓜菜。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栽种过高粱。这是一种生长缓慢的蔬菜，通身颜色暗绿，往往一个冬天过去了，在消融了积雪的泥泞大地上，看见它们和去年刚栽种时相差无几的样子，让人无端生出一种气馁，仿佛心中某种期望被辜负了似的。是啊，栽种之初，有谁不在心底里描绘日后它们蓬蓬勃勃的景象呢？可是直到春天来临，随着温暖湿润的地气袅袅上升，个头矮小的高粱才略微抬了抬头。

我上初中时，读吴伯萧的《菜园小记》，里面有作者引用的一句谚语：“瓜菜半年粮。”觉得特别温暖。因为，即使距离那个艰苦年代已然遥远了，但瓜菜在偏远乡村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或许也是这个缘故吧，每年春夏播种时节，父亲选种的瓜菜大都个头肥硕，产量很高，而且易储存，比如南瓜和冬瓜之类。至于那些味道鲜美却产量不合人意的，譬如高粱之类的，基本不在父亲的考虑范围。

初夏时节，南瓜就已经长到拳头大小，上面花蒂犹存，便可以吃了。冬瓜个头稍大些，上面有着密密的绒毛，仿佛毛毛小孩的脸。这时节南瓜和冬瓜的味道特别鲜美，只是有铺张浪费之嫌，张扬着难言的奢华，仿佛时下在小镇里流行开来的吃烤乳猪，在父亲眼里，这是多么暴殄天物的事情，是多么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南瓜和冬瓜只有在足足过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阳光之后，只有储存了足够的能量与糖分之后，父亲才将它们孩子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抱回家。

这些圆滚滚的南瓜和冬瓜要一直吃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在整个漫长冬季里，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瞥一眼堆放在某个干燥角落里的它们——南瓜金灿灿的，冬瓜的表皮则青里透黄。自始至终，它们一直保持着这种鲜活如初的表情。这是一种让人在心底里为之释然并且踏实的表情。

当然，常有不期然的事情发生。到了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冬瓜，里面竟然出乎意料地溃烂了。可想而知，这种肝肠寸断的溃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应该是一个颇费时日的漫漫过程。小时候只是觉得惊讶和惋惜，长大以后，时常陷入这样的臆想之中：一个冬瓜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伤痛呢？巨大的伤痛从内部把它摧毁，日复一日，可它平静的神情中似乎并没有丝毫流露。

后来，读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战栗之余，竟然不伦不类地与冬瓜联系起来。脑海里总是铺展开来这样的画面：在积雪的广袤背景之上，是暗淡的圣彼得堡，建筑的尖顶像匕首一样在灰茫茫的笼罩之下闪着寒光，狭窄街道上偶尔有马车驶过，疾驶的车轮下面，积雪化作一片污浊的泥泞。一个面容平静的女子，伫立在街道边上，任凭寒风从脸颊掠过，或者，她长时间置身在一扇紧闭的窗户后面，目光透过窗户的缝隙，越过圣彼得堡的街道和建筑，落在空茫积雪的远方……阿赫玛托娃的内心深处，莫可名状的剧烈之痛在起伏，可是，有谁听过她的呻吟呢？

如果她将内心的疼痛大声地喊出来，或许好受一些。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殡葬场面，一个失去了亲人的女子，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她选择这样宣泄内心的痛苦。之后不久，就可以看见她行走在曾经走过的田埂上，就可以看见她手里握着丈夫曾经握过的锄头或者镰刀，疲惫不堪或者轻松自如地以一个妻子或者母亲的角色继续在生活的阳光和风雨里出没。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平常女子与一个伟大诗人的女子的区别。

1994年到1996年，对我的家庭来讲，是非常不幸的三年。57岁的父亲、正值壮年的舅父、8岁的外甥女相继去世，这一切如此突然，让人措手不及，难以接受。

舅父和父亲的死对母亲打击最大。母亲当初号啕痛苦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哭过之后，母亲就平静下来。当母亲的身影在夏天开满了豆花的山坡上或者秋天稻秆金黄的田野穿行时，没有谁会想到，眼前这个普通农妇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相继失去了手足情深的兄弟和相濡以沫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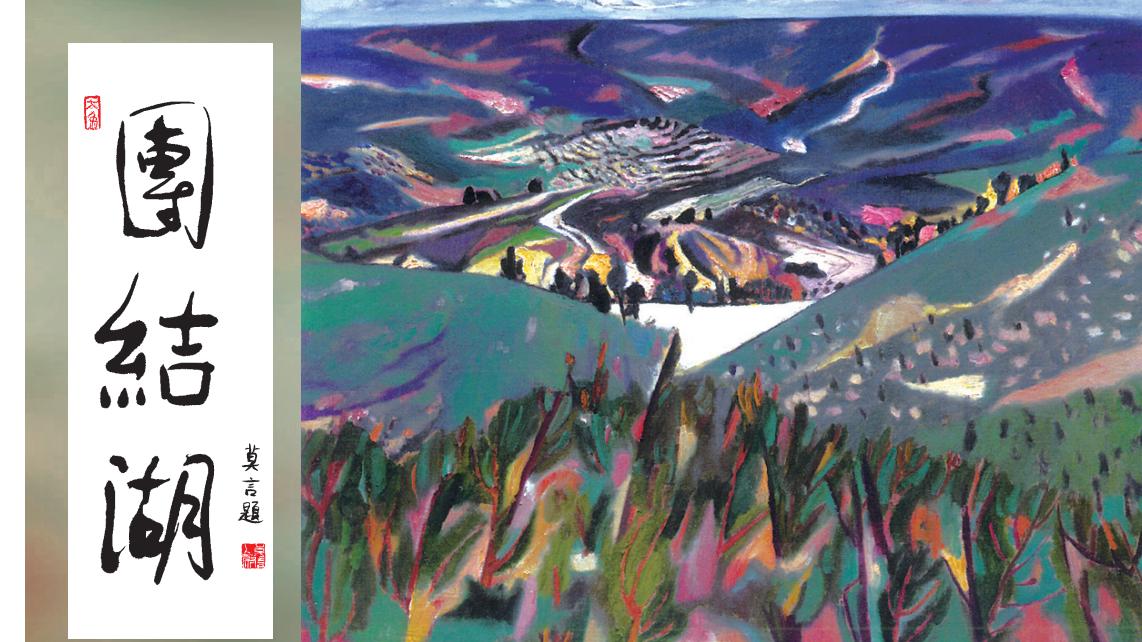
外甥女灿烂如花的生命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戛然而止的。在小镇简陋的医院里，当我将她的身体与医院污浊不堪的床单分开，然后紧紧地搂抱在怀里时候，我感到了她尚存的最后一丝体温在缓慢飘散，我分明看见一条曾经喧哗的河流在自己的怀抱里彻底沉寂下来，却又无能为力，内心的悲痛难以形容。

更为悲痛欲绝的当然是二姐。很多熟悉与不熟悉的人纷纷劝慰她：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二姐号啕大哭起来。哭泣的二姐渐渐从之前的木然状态有所醒悟，她开始交代我们怎样给外甥女做最后一次打扮，她特意要求我们买来一条连衣裙给外甥女穿上，然后目送小小的棺柩被抬着朝最近的山坡走去——她的目光已然平静下来，仿佛不是永诀，而是和昨天早晨一样，目送着蹦蹦跳跳的女儿往渺渺晨曦覆盖下的学校走去。

10年过去了，二姐第二个孩子也已经8岁了。在黄昏斜晖里，放学回家的孩子络绎不绝，从二姐满怀期待的偶然一瞥中，我终于知道她内心里的伤痛仍然在起伏。我最终明白，哭其实无济于事。一个平常女子也好，一个伟大诗人也好，甚至在我们看来毫无生命知觉的一个冬瓜，这种断肠之痛其实是难分彼此的，它恒久而永难消弭。

母亲很少到父亲的墓地里去，她只是询问我们：父亲的墓地又长了多少青草吧？或者，冬天的时候那里阴湿寒冷吗？可不可以沐浴到阳光呢？母亲平静的语气仿佛在询问山坡上庄稼的长势。因为这种平淡语气的掩盖，让我们做子女的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母亲的心其实正在疼痛不已。

阿赫玛托娃采取的却是另一种方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阿赫玛托娃肯定一次次在圣彼得堡寒冷无依的黑暗中醒来。她用一双女性纤细而又坚忍的手，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丈量似的抚摸，只有她清楚，那无人知道的深处，尤其是心脏一带的位置，溃烂的面积在一天天扩张。然后，她用这双抚摸过伤痛的手，写下——“我的诗歌里全



鄂尔多斯·春天的高原 王克举 作

世界屋脊上的文学情

□杜文娟

望着战士由于高原缺氧、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而变得黢黑干裂的脸庞，问他大多年龄，他用军人特有的洪亮之声告诉我：1